

三千年史从头说

——读《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

程章灿



《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薛冰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本图是根据地质考古绘成的三千年前秦淮河下游形势模拟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陈大海供图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人文荟萃，历史积淀极为丰厚。这个城市从来就不缺少故事，也许它所缺少的，是像薛冰这样博雅的知识人。薛冰的讲述，容易让人昏昏欲睡；而别出心裁的叙述，就会引人兴味盎然。讲述人是否博雅多识，是其中的关键。岁在甲辰，新春伊始，捧读薛冰新著《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我顿生兴味盎然之感。

这本书从南京新发现的长干古城写起，这是一个崭新的话题，着实吸引人。2023年12月19日，很多媒体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在对中华门外西街地块进行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当日召开了“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会上，权威专家一致认定，在西街发现的“越城环境聚落”应该定名为“长干古城”，始建于3100年前的商、周时期。此前，人们一般认为，南京建城史始于周元王四年（前472年）越王勾践在长干里所筑的越城，距今2500年。而这次最新考古发现确认，越城其实是在长干古城的基础上筑成的。这意味着，南京建城史被一举提前了600年。毫无疑问，这是南京城市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消息传开，南京人奔走相告，长干古城也成功“出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薛冰新书应合了这次考古新发现的节奏，适时推出，得天时，占地利，相得益彰。

西街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长干古城的存在及其与越城的先后关系，更为难得的是，考古学家在这里还有重要的发现：在古称“越台”亦即越城的这块台地之下，垂直层累着九个地层，从南宋周初、春秋战国、六朝直到明、清、近现代，绵延3000余年，都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印记。地层埋藏越深，文物年代越久远。各个地层中发现的文物及其遗址，好比时间之海的遗珠，可以串连起南京城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发现背后的潜台词是：南京城市史和人文史有必要重写了。事实上，薛冰这部新书已经结合既有的与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从北阴阳营文化、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到长干古城和越城，为南京人文史的滥觞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在书中，薛冰还提出这样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设计方案：“倘若能在未来的越城遗址公园中，设计一座城市史博物馆，将南京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系统、准确、全面、形象地呈现出来，无疑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景观。”他对越城遗址的情有独钟跃然纸上。

说是开门见山也好，说是先声夺人也好，总之，长干古城在本书中的位置十分突出。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就是“长干古城：千古之谜”，这样的布局与标题，足见薛冰对它的高度重视。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述长干古城的故事。长干古城虽然年代久远，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的文物证据。而在长干古城基础上建起

的越城，则有传世文献作为见证。越城俗称“越台”，因是越人所建、且建于一块台地之上而得名；相传它是辅佐勾践灭吴的越国谋士范蠡所筑，所以又名“范蠡城”。这两个地名已见于《建康实录》和《景定建康志》，这是南京现存最古老、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两部地方志。从这两部书中可以看出，直到六朝时期，越城依然是南京城攻守的重要军事据点，此地战事不断，兵家必争。这一方面的传世文献记载，如今终于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明，身临其境者，便平添了几许亲切感。

早在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提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需要用“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验证。所谓“纸上之材料”，主要是指传世的各类纸质文献；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既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物。薛冰新书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自觉运用了“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新知，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史料，开阔了作者的视野，也激活了读者的联想和思考，这使薛冰所讲述的南京人文故事既有个性，又有可读性。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从“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写起。南京号称2500年建城史，就是从越城算起的。但是，大多数南京史志都只是简单记载越城的建造年代、位置和周长，很少涉及越国建城的具体目的，好像修筑越城只是越军的一个偶然行为，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不深究其背后实际隐藏着越王勾践的雄图霸略。《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引《金陵杂记》，说到越国“欲图伯（霸）中国，立城于金陵，以强威势”，却是语焉不详，没有具体展开。薛冰根据南京处于“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特点，结合马王堆帛书《繆和》《韩非子·说林》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文献材料，论证“越城的功能，正是作为防范越国的一个前沿阵地，其战略意义在于及时掌握楚军的动向”，眼光开阔，很有见地。

3100年的南京人文史上有很多有趣的话题，也有许多待破解之谜。周泰伯奔吴的故事是否可靠、金陵王气的传说内涵何在、莫愁湖名称的来历如何，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题故事性很强，经过数百年甚至2000多年的辗转相传，难免掺杂后人的增饰和想象，真假难辨，费人猜详。要重新审视这些古老的话题，也有必要将“地下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结合。例如，广为流传的“泰伯奔吴”的传说，非但是吴文化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与南京人文史有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一传说的可信度，已经有过很多讨论。薛冰新书不仅将这一传说作为南京史和吴文化史的重要问题来考察，更将其置于整个中国上古史的背景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间所使用的“二重证据”，无论是地下材料还是纸上材料，都颇为可观。

在材料搜集与使用方面，薛冰有得天独厚条件。一方面，他是博览群书的学者，又是著名藏书家。他对文学、历史、版本学与印刷术、艺术史、佛教史、建筑、园林、饮食、钱币学与经济史、教育与科举史、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厚兴趣，涉猎甚广。他的图书收藏面也很广，尤其注意收集有关南京学研究的文献材料，数十年下来，积累的数量极为可观，可谓汗牛充栋。在此基础上，厚积薄发，融会贯通，这是学者薛冰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薛冰定居南京70余年，喜欢城市行走，南京的大街小巷、山水水、考古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熟悉不同时期的南京城市空间和事件较妥帖地还原到相应的空间中去，而非天马行空地随意挥洒”。这是作家薛冰的独特优势。

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不仅定位了薛冰，也定位了薛冰这本新书的写作。薛冰对《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一书的定位，“是一种学术普及著作，意图在艰深的学术研究与大众阅读中间充当一座桥梁”。因此，他“希望能

以尽可能严谨的方式研究，以尽可能平易的文字表述，所以在行文上采用散文笔法，深入浅出，减少大众读者的阅读障碍”。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严谨性与趣味性的统一。如果说，二重证据法和多种史料的使用主要体现的是学者薛冰严谨性的一面，那么，他的章节标题和行文风格，则主要体现的是作家薛冰趣味性的一面。

从长干古城到民国建立，南京人文史3100年，被薛冰安排于17章的叙述框架之中。不妨先来看看本书前五章的目录。第一章是“从先吴文化说起”，第二章是“南方三国演义”，第三章是“秣陵：王气之谜”，第四章“东吴：古都初建业”，第五章是“建康风云”。相信读者只要翻到这个目录，就会被其吸引住，就会饶有兴趣地细读下去。南京既然号称六朝古都，那么，对六朝时代的南京人文史的叙述，显然应该是书中的重头戏。薛冰在这一方面用力甚深，20多年前就出版有《家住六朝烟水间》，书中对六朝故事的讲述十分引人入胜。新出炉的这部《南京人文史》，书名中特别标榜“烟水气”和“帝王州”，这是两个具有浓厚六朝意味的主题词，可见作者对于六朝的惦念从未减少。

第五章“建康风云”，可以说是本书中最为六朝的一章。只要浏览一下本章各节以及小节的题目，就可以想见作者设计叙述的用心：第一节“王与马，共天下”，共有六小节：门阀士族与皇权、笼络江东士族、君相之争、王庾之争、皇太后褚蒜子、谢氏继起；第二节“皇帝轮流做”，亦有六小节：桓玄篡夺、刘裕代晋、禅让前史、齐梁相继、侯景之乱、梁武帝的不肖子；第三节“胭脂井”，共有四小节：陈宫风波、平民女儿张丽华、陈叔宝的悲喜剧、南朝的尾声；第四节“金陵王气”，细分为四小节：东吴尚王气之说、西晋的王气、“五百年后”天子气、黄旗紫盖；第五节“三朝元老与九品中正”，包含四小节：三朝元老、九品官人法、高门与寒士、梁武帝改革官制；第六节“立号都建康”，包含三小节：晋成帝营建苑城、军垒环卫、城市比王朝长久。可以看出，这些节和小节并不是以编年序列来安排的，而是按照主题线索来安排，大小题目都有相当强的故事性。薛冰说，贯穿全书的王气隐显、文脉绵延、商贸集散和佳丽沉浮等四条主线，具体到各章，其贯穿的主线又有所不同，很明显，贯穿第四章的是“王气隐显”和“佳丽沉浮”这两条主线。

在网络空间，特别是在爱书人的圈子里，“金陵薛冰”的大名早已传扬遐迩。大凡关心南京文史的人，无论少长，都知道薛冰是讲述南京故事的资深老手和一等高手。每逢薛冰有新作推出，人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购读之、谈论之。年逾古稀的薛冰为我们捧出这部长达70万字的新著，我有幸在第一时间拜读最新“出炉”的这部薛冰作品，掩卷之际，禁不住合十赞叹：薛老师真是宝刀未老啊。

听闻艾丽丝·门罗去世，我一阵怅然。犹记得第一次听说这位女作家，还是在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随后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她的小说《机缘》，第一次邂逅了她的文字，小说的女主人公朱丽叶立即把我迷住了。从李文俊先生翻译的《逃离》开始，我前前后后购买了她的所有小说集的中译本，这还不够，又陆续买了英文原著。当然，英文本只读了一点。我觉得，好的文学是不怕翻译的，哪怕翻译让文字失去了一些原味，也不妨碍读者去接近、去拥抱。喜欢门罗的人，都忍不住想让人分享阅读时的震撼和满足，忍不住想让世界都知道：门罗的文字是闪闪发光的！

越深入门罗小说的世界，越让我感到，她的小说并不只是写了遥远小镇的人们，她写了我们每一个人。她用文字拥抱生活，拥抱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人物，拥抱这世界角角落落的人们。她笔下的物会犯错，那是人类的错，也是神的错，是明明可以避免却终究未能避免的错。在她的故事里，我们照见自己，怜悯自己，也宽恕自己。例如门罗有一篇小说《骄傲》里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不可理喻而又令人动容。

曾经读到格林童话里的一篇《圣母的孩子》，童话里的女孩明明打开了第13道门，手指因为碰了不该碰的圣物而变成金色，明明谎言一眼就能被看穿，而圣母答应只要坦白就会原谅她……可是，这个女孩子，就是一遍遍地回答：“没有，我没有打开那扇门。”因为死不承认，以至于被圣母逐出天堂，在人间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虽然在被烈火焚烧死到临头的那一刻，她终于开口，终于承认，因而得到赦免，但总让我感到：撒这样没有意义的谎，为此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实在太不值了，太不可理喻了！

《骄傲》里的奥奈达，有点像格林童话里的这个女孩。奥奈达的处境曾经是小镇上的名门望族，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家族风光不再。到二战结束后，奥奈达所拥有的只有一幢祖上留下的老屋，即便这栋老屋也最终不保留，卖掉后她成为公寓里一个普普通通的租客。总之，小镇已经步入一个新时代，奥奈达及其家族早已退出小镇的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却不能回避的现实：“事实上，既然现在大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一大部分的她也随之而不存在了。小镇在变化，她在其中的位置在变化，而她却几乎不知道。”战后小镇已经被新搬来的人改变了，奥奈达自己也改变了，可她却迟迟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最终她的一席话把“我”和她的前景毁了。

作为叙事者的“我”，一直在暗示奥奈达如何对于自身的处境不自知，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活在过去的记忆里不能自拔：作为小镇男孩，“我”一生就是免辱，虽然经过整形基本上看不出来，却难掩自卑。在他眼里，奥奈达一直是一个闪闪发光无法靠近的形象。战后，卖了房子后的奥奈达常常来他的房子做客，两个单身男女一起看电视，一起吃饭，甚至在他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他们原本可以很自然地搬到一起，而且奥奈达也鼓起勇气提出了这个建议，不料“我”竟生硬地拒绝了奥奈达的提议，随后也迅速把房子卖掉，最终也搬进了那个被称为“埋骨之地”的单身公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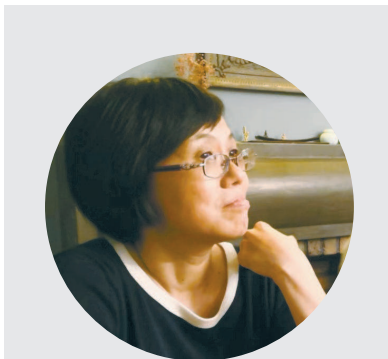
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当然是因为骄傲——明明是想跟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奥奈达说出口的却是：“我们可以像兄妹一样住在一起，像兄妹一样照顾，这将会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每个人都会如此接受的。他们怎么会不接受呢？”这深深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因为在他看来奥奈达从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男人接受，而且这话暗示出小镇上的人也是这样看待的。这让他感到羞辱，“感觉一扇门被关上了。”小镇上这一对相濡以沫的单身男女，却因为不可理喻的骄傲而错过，多么可惜！但真的是不可理喻吗？在一个有历史的小镇上，除非你离开，永远地告别，否则就不得不活在别人来说已经死去的时间里。在有记忆的地方，自尊心最容易受辱，很多时候，嘴硬、撒谎，只是为了维持一份可怜的自尊，却因此犯下不可挽回的错。

骄傲会让人做出相反的选择，自卑亦然。如果不是因为一直隐藏在心底的自卑情结，“我”也就不会对奥奈达的提议如此怒不可遏，以至于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直到后来的某一天，遇到一个小镇上的熟人，他才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无论你早前可能有过怎样的残疾，只要活到现在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将那些缺陷抹去。每个人的脸上都会遭受岁月的侵蚀，绝不仅仅是你的脸。”自然奥奈达也一样，她也不再年轻美丽，不再那么自信满满，她提出那个建议的时候，不过是用傲慢的言辞掩饰真实的心意罢了。

这个迟来的判断能否改写结局？小说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在“我”搬家前夕，两人看着后院鸟浴盆里走出来的一只只臭鼬，沉浸在无声的喜悦中。这个结尾暗示着什么？很难猜透。门罗在一次访谈中说，在《亲爱的生活》这本小说集里，她最喜欢这个场景。我的理解，这是一个无声胜有声的场景，一个自我赦免的场景，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开口，因为已无需开口。在童话里，撒谎的人必须面对神的审判，一次次遭受审问，一次次被迫开口，承认“是”或“不是”，向上天坦白一切。但在凡人世间，并没有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也不能指望神来替你裁决，帮助你挽回错误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最初，最后，也是最亲密的话

乔丽华



乔丽华，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



《亲爱的生活》[加拿大]艾丽丝·门罗著 姚媛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误。谁能避免一生中不会犯下过失，不会隐瞒、撒谎、干蠢事？何必没完没了地追究谁对谁错？不如就这样默默原谅，一笑置之，岂不更好？

童话里的世界总是有始有终、斩钉截铁、善恶分明，现代小说里的故事，特别是门罗笔下的故事，多数时候却是兜兜转转，看了半天还是追查不到真相。往往是读到最后，再回过头去读开头的部分，你倒又能有所悟。《骄傲》这篇小说，劈头写道：

有些人把一切都弄错了。怎么解释呢？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可以让一切对自己不利，比如说，经受了三次打击，或20次打击，结果却没事……

乍一看这个开头简直不知所云，读完“我”和奥奈达的故事，回过头来看，又似乎明白了其所指：有些人早年犯错，却仍选择一辈子住在小镇上，一辈子被人记住他们那些丢脸的事，却还要嘴硬地证明自己“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有些人年轻时为自己挖了一个坑，然后继续不停地挖下去，“如果别人有可能注意到，他们甚至会挖得更用力地挖”。这两类人，大概就是指奥奈达和“我”这样的人吧？但也可能就是我们周围的某些人，我们自己。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愿意回头，不能回头，不肯承认自己犯下的错，以至于不能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话说回来，或许人一生就在于自己挖坑，一直不停地挖，直到把自己埋进去。这样看待人生，是否太悲观？还是因此反倒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得到某种解脱？不同的人大概有不同的答案。

门罗的这本《亲爱的生活》出版于2012年，如今已成封笔之作。集子里好几篇小说的结尾，不似以往的决绝利落，倒是常常给人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能够接受背叛，接受失去，接受所不能接受的事……最后一篇《亲爱的生活》的结尾写道：“我们会说起某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某些让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但我们原谅了，我们每次都原谅了。”——走过了80多年的人生路，原谅，赦免，难道不是最好的主题？这是门罗写给我们的最初，最后，也是最亲密的话。

走出社交媒体的回声室

付杰

放和包容。正如中国人的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就可以走出回声室和信息茧房——事实果真如此吗？杜克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贝尔的《打破社交媒体棱镜》告诉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即使社交媒体可以促使用户广泛、便宜地接触到不同的观点，然而，他们不仅难以走出回声室，反而会变得更加思想窄化和极端。这个结论无疑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为了测验打破回声室的结果，克里斯·贝尔使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人类行为实验。我们知道，当下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现象十分普遍，左派与右派严重对立，保守势力与自由势力激烈抗衡。克里斯·贝尔分别让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用户长期接收对方阵营的消息，试图改变他们固有的政治观点。实验结果表明，这些用户非但没有滑向政治光谱的中线，反而变得更加极端：保守的更加保守，自由的更加自由。

对这种现象，我们通常会认为，是社交媒体的算法推送，让用户的视野愈加狭隘，反映到政治立场上，则是政治部落主义。但克里斯·贝尔的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果：是我们内心深处持有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进而延伸到社交媒体上的种种行为。因此本书提出了“社交媒体棱镜”这一概念。社交媒体像是一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社会位置中的巨型镜子，但不同于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所说的“镜中我”理论，这面镜子更像是“弯曲”和“折射”我们社会环境的棱镜，扭曲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身份的认知。社交媒体棱镜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呢？克里斯·贝尔通过对政治极端派和政治温和派这两类群体的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运作的某种内在逻辑机制。

其一是政治极端派。在国内的语境下，这类人往往被称为“网络喷子”“键盘侠”“红精”“黑子”等。我们在网上认识到了太多这样的人，通常也不愿与这类人交流。但一个看似吊诡实则可以理解的现象是，极端主义者往往会获得较高的关注，助长平台的流量，而在政治场域，社交媒体会使极端主义正常化、合理化。因为极端派很容易互相发现，形成一个彼此支持的社群，在这个社群内部，极端话语的泛滥，也就显得见怪不怪了，这就会导致“一致同意谬误”的假象，极端主义者会认为大部分人都认同他们的观点。

其二是政治温和派。政治观点通常是呈正态分布，并没有那么多的“沉默的大多数”。温和派之所以沉默，正是由于其“温和”、“不愿（或不屑）与极端主义者正面交锋。正所谓“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极端主义者的声音占据主导，裹挟和劫持了主流观点，温和派更容易陷入沉默的螺旋，不愿发声抵抗，最终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而温和派在社交媒体上的缺位，用作者的话来讲，“这是社交媒体棱镜造成的最深刻的扭曲”。

正如本书副标题“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所示，克里斯·贝尔还探讨了如何走出政治极化的“兔子洞”，阻断社交媒体棱镜和虚假政治极化之间的反馈循环。

存在，认识到它是如何扭曲我们对自身和他者的身份认同，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对话对象和正确的交流方式。

其次是学会通过社交媒体棱镜正确地看待自己。希腊圣城德尔斐神谕上有句著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自我认知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这也是我们减少政治极化、超越党派分歧的重要途径。认识了自己，也有助于认识他人，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展开建设性的对话，更容易取得预期效果。

最后，在认识社交媒体棱镜以及自我和他人的基础上，可以尝试改变自己的行为，与对立阵营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如对己方阵营持批判态度以打开局面，避免谈及政治极化的意见领袖等。在本书中，作者也进行了大量详细的实践，结果证明问题得到了改善。

当然，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教授所指出的，针对社交媒体棱镜，本书存在着分析问题深刻、解决问题时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具体而言，作者寄希望于温和派，而非寻求平台治理和社会治理，希望从顶层设计上找到解决方案；此外，作者的政策建议也并非普遍适用，由于国情社情民情的不同，我国网民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观念不同于美国，其药方也未必对症。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美]克里斯·贝尔著 李坤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互联网文化愈演愈烈的当下，数量众多的App搭建了一座跨地域、跨文化的知识桥梁，曾经遥不可及的信息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近在眼前的事实。然而，大数据算法愈加精准地拿捏用户的喜好与习惯，以过滤气泡的方式，使其接触到的信息趋向同质和单一，再加上人人皆有的选择性接触倾向，用户看似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实则被困在了信息茧房之中，难以听到多元的声音，看到不同的风景。与过滤气泡和信息茧房类似的概念，还有回声室效应。也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相似的声音不断重复与回荡，人们逐渐强化这些声音，直至扭曲成一种刻板印象，误以为这些片面的信息就是事实的全部。